

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管理：对 Oded Shenkar 的评论和回应

Klaus E. Meyer^①

摘要：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们正争论如何在全球的学术讨论和理论框架中定位自己的工作。在这篇对 Oded Shenkar 的回应中，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已经认识到了社会的多样性，然而管理学对社会多样性的理解却非常肤浅。由于管理是一种社会嵌入活动，因此对社会情境的了解对于管理研究的相关性和严谨性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在这里领先的管理研究是基于实证的研究）不同的情境下，比如中国。因此，深入理解情境如何和为何发挥关键作用，应该是管理学者首要的关注点，不仅在中国应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应如此。在此我提出了一些在中国进行情境化管理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比较管理研究；特定情境研究；社会多样性；全球管理知识

一、引言

像 Oded Shenkar 那样，我从分享“我来自哪里”开始我的文章，因为个人经历会形成对许多问题，包括研究重点的认识。首先，我是欧洲人，从小就接触过不同的国家，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德国、英国和丹麦）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经历带给我一种内在的认识，即不仅文化和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企业运作的方式乃至企业存在的目的也各不相同^②。这种对国家多样性的认识在较小国家受教育和生活的人当中会更加深刻，因为他们没有单一的基准文化来与“外国”文化或经济进行比较。

其次，在我读博士学位之前的研究中，我和许多同行都对日本企业的崛起着迷，

^① Klaus E. Meyer，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② 例如，大多数美国商业教科书的前提都是：公司的目的是为股东服务。这已经被纳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公司法中。然而，这与那些将企业优先视为社会组织的社会直接相冲突，甚至与一些宪法相冲突，例如德国宪法规定：“财产的运用有义务。财产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德国基本法，14条(2)]。

它们既是出口商，也是外国投资者。因此，我们努力去理解日本企业强大崛起的历史情境，以及支撑它们国际竞争力的管理方法。我们阅读文献的作者包括 Ronald Dore (1987) 和 Frank Gibney (1982)，也包括像 Kojima 和 Ozawa (1984) 这样的日本作者。虽然这一类文献对日本奇迹的来源没有定论，但它清楚地指出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促进日本管理实践（例如质量管理小组和及时生产）演化的条件。其中一些管理实践后来影响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管理实践。

最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的博士研究中，其中一个中心主题是中欧和东欧的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比较经济学（也被称为经济制度学）的学者们有了接触。这个研究领域传统上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差异，但在 1990 年之前，注意力已经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差异（如 Dore, 1987）和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差异（如 Kornai, 1986）。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们讨论着在转型经济体中发展何种资本主义，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银行相关的经济学家（如 Bleijer et al., 1993; Estrin, 1994; Lavigne, 1995; Murrel, 1991）。

考虑到我的上述知识基础，在我看来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对发展普适性的“一般理论”的追求，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学科而言显得相当奇怪。毕竟，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管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解释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嵌入在社会当中的。因此，如果不了解社会情境，管理研究

充其量只能浮于表面，而很少能产生与实践相关的洞见。

我自己的学术之旅的特点是，努力了解特定的情境，并抽出超越特定情境的相关洞见。我在越南的工作的项目中成功地为不同的受众写作。为了了解当地的情境，我们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工作，他们为我们的著作做了很大贡献（Estrin & Meyer, 2004）；我和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发表了一系列实践导向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题包括“在越南做生意”（Meyer et al., 2006），“与当地国有企业合作”（Nguyen & Meyer, 2004）和“以并购作为进入战略”（Meyer & Tran, 2006）。对越南情境的深度介入为发展“次国家制度”（Meyer & Nguyen, 2005）的理论概念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后来被学者们接受，并经常为关注其他情境的学者们引用，特别是在中国情境的研究中（Chan et al., 2010; Filatotchev et al., 2007; Shi et al., 2012）。我们在越南收集的数据也被我们用来做跨国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层面的变量是研究的主要贡献所在（Estrin et al., 2009; Meyer et al., 2009）。当我们第一次设计这个项目并申请研究资助时，类似的多国分析是我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实现这种协同效应并非总是那么简单。

在中国生活了六年后，我注意到从不同的视角将本地洞见与全球学术话语联系起来是巨大的挑战。我通过与企业打交道而获得的许多洞见，很难与那些似乎更常坐在“象牙塔”里的学术受众和评审专家交流。同时，我发现发表在一流期刊上的文章经常表现出对中国商业的肤浅理解甚至误解，特别是那些不积极与中

国企业打交道而依赖档案数据做研究的学者的文章。这包括出生在中国，但在美国度过大部分学术生涯的学者，他们更多地受美国激励机制的影响（如 Oded Shenkar 所指出的那样）。例如，对公司治理的研究通常会引用委托—代理理论，然而，在中国的组织中谁是谁的委托人往往不是很清楚，比如政府官员或党委书记掌握的权力有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官方头衔提示的名义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美国式的关于谁是委托人、谁是代理人的假设，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分析。

在 2008 年 9 月前后，我搬到中国前不久，人们对“西方知识”与当地现实之间差异的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三个主要事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四川地震的成熟处理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观察者眼中金融危机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商业模式的榜样作用）。最近，西方社会在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政治分歧进一步削弱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些高层次的社会变革也影响着西方管理知识（包括学术理论和商业教育中分享的最佳实践）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在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样 EMBA 和 MBA 项目中本土的自信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欧商学院的课堂，参与者很少满足于对外国案例的讨论，他们更想讨论一下中国企业的最新实践。

这篇文章反映了在这样一个文化、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世界里，我的个人经验和我个人对于管理研究的观点。我首先探讨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也包括管理学）的知识根源；随后，在提出如何更好地将情境引入中国管理研究的

建议之前，我将讨论比较管理研究的挑战。虽然我对当代管理学术研究的观点和多样性的看法与 Oded Shenkar 不同，但当我试图找出未来的方向时，我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化根源

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深思人类社会。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支逐渐脱离哲学，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社区，管理学就是其中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在欧洲，随着中世纪末期取代拉丁语成为“通用语”的国家语言的兴起，知识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哲学家和其他以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或英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了独特的知识传统。在欧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有很强的传统，在商学院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历史学派（它们强调了经济活动的历史情境）（Schmoller, 1904）和法国的实证社会学的起源（Durkheim, 1895）。现代盎格鲁—撒克逊理论很少承认这种非英语作品的贡献，除了少数转而将英语作为交流媒介的学者，如熊彼特（1939）和哈耶克（1944）。

对我思考商业和经济尤其有影响的是 Walter Eucken（1952；也可见 Goldschmidt & Wohlgemuth, 2008），他分析了竞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支持框架条件，建立了“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说中，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我却一直都没能找到他的作品的英文译本。

Eucken 对市场经济的组成和监管原则的分析，预测了许多后来在盎格鲁—撒克逊理论中

流行的观点，如 Douglass North（1990）的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Eucken 从未想过这些制度会自发地出现。

管理学是社会科学中很奇怪的一个。正如 Oded Shenkar 所强调的那样，在 20 世纪中期，很显然美国商学院在管理学教育方面是很有开创性的，然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缺乏与管理学术相关的科学见解，礼貌点说，这种观点是民族中心主义的。马克斯·韦伯（1920）（根据他死后 30 年出版的一份不确切的译文）是欧洲大陆唯一一位影响美国管理学的重要学者。这一事实更多地表明美国商学院自身的封闭性，而非英语国家以外国家学者的学术水平不足。

因此，我不同意 Oded Shenkar 的观点，即“美国几乎仍然是所有管理理论的来源和实地研究的主要地点。虽然期刊也发表少量比较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美国仍然是恒定不变的主要参照物。换句话说，如果研究的是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它更多地被选择来与美国形成对比（下文中我将说明该类研究将使中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借用一句政治术语：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该领域的‘核心国家’。因此，大多数人可能很少注意到，我们写作的对象一直以来都是掌舵美国公司的高管。同时，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研究需要有实践意义，但是整个研究领域其实大都承认了我们的研究与现实脱节。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将美国作为写作对象的研究者”^①。

对美国管理学会的出版物和美国商学院的学者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实际上自称为

管理学会，就是对自身有限的全球相关性无知的表现）。但对于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和美国数据打过交道以及没有在美国商学院工作过的人来说，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了。欧洲管理期刊，如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and Human Relations* 等，在出版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研究上都有悠久的传统；*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和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也正在成为亚太地区有洞见的非主流商业研究的主要发表渠道。

不幸的是，许多商学院尤其是美国的商学院，为他们的学者们提供的激励机制使他们把重点放在那些以美国学术期刊为主的期刊列表上；在管理学领域，这些期刊列表包括的也就是美国管理学会认为优秀的学术期刊。遗憾的是，亚洲的学校往往会效仿美国学校来建立其期刊列表。这对其保持工作的相关性是有害的。我一直认为，商学院应该确保其激励计划与其使命保持一致，包括它们的期刊列表。因此，如果一所亚洲学校的使命中有“本地相关性”，那么它应该在其晋升和终身教授的标准中，承认一些专注亚洲的学术期刊（Meyer, 2006）。

相比之下，经济学领域从来没有像管理学那样以美国为中心，尽管对数学建模的关注已被指出在发展情境嵌入和实践相关的知识方面也同样没有帮助。在经济学中，比较经济学和最近的制度经济学都探索了不同国家的多样性。例如，比较公司治理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承认股票市场和银行系统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差异（如 Dore, 1987）。但是，实证制度经济学的主

① 引自 Oded Shenkar: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管理学季刊》2017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4 页。

流在利用各种指数来捕捉大规模多国数据库中的国家特征的同时，已经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层面的差异上。然而，这类研究的一个假设是存在一个这些指数的单一最优的构型。

资本主义多样性 (Hall & Soskice, 2001; Jackson & Deeg, 2008) 和商业体系 (Whitley, 1999; Redding, 2005) 的文献提供了关于不同国家存在差异更丰富的视角。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仅在规制制度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不同的经济主体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方面也各不相同。特别地，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强调了如教育机构、银行和企业等参与者之间合作互动与竞争互动的差异。如果不同系统的内在逻辑各不相同，那么把一个国家的制度放到另一个国家并期望它产生同样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在亚太地区，Michael Witt 和 Gordon Redding (2013, 2014) 发展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观点，他们强调了亚洲各国间国家参与商业的不同形式。最近，在国家层面上，新的 fsQCA 方法的应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多样性观点的发展。具体而言，Judge 等 (2014) 应用了 fsQCA，并发现多种不同的制度安排都可以产生高水平的经济福利。

三、为什么这么少扎实的比较管理研究

管理是一种社会活动，在各种不同的组织和国家情境下进行，任何管理实践的有效性都是由其特定的情境所决定的——Geert Hofstede 雄辩地解释道 (1993, 1995)。国家情境的差异是国际商务领域的核心——无论是商业战略和实践的变化，还是跨国商业面临的挑战

(Meyer, 2013; Shenkar, 2004)。

然而，尽管人们认识到各国之间系统性差异的重要性，但在管理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实的比较研究工作。为什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很难做到，相关的数据很难获得。对一小部分国家进行比较通常会发现许多差异，并能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深入的描述 (如 Redding, 2005; Witt & Redding, 2014)。然而，这样的工作使建立可测试的因果关系变得困难：在国家文化、法律法规和经济基础的所有变化中，什么是解释观察到的管理实践变化的关键？一个有用的方法是进行更多跨国家情境的系统的复制研究 (Tsang & Kwan, 1999)，幸运的是，至少有一些管理期刊正在改变其之前对复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排斥态度 (Bettis et al., 2016)。

当美国被用作基准时，双边比较的洞察尤其有限，因为美国在文化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特例 (如 Henrich et al., 2010)，这也为 Oded Shenkar 所指出，更有洞察力的见解可能来源于比较具有相同核心特征但在关键维度上不同的相邻社会，例如中国和印度，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等 (White, 2002)。这使得学者们可以关注情境差异的特定方面，从而更清晰地解释情境的哪些方面可以解释商业实践的变化。

或者，学者们在大型的跨国数据库的市场分析中借助纳入国家层面变量来研究多个国家。然而，这种方法往往会遇到至少两个度量问题。首先，不同维度的情境变量是高度依赖和相互关联的。从理论上讲，跨国分析应该包含多个维度，但这需要有来自大量不同国家的公司的

数据，当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主要挑战。其次，管理学理论（或社会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构念本身是与情境相关的，因此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中进行测量——要么是因为构念不适用，要么是因为被调查者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问卷项。因此，研究者需要在数据覆盖的广度和合理地测量构念之间进行权衡。

鉴于多国研究面临的挑战，一些学者选择了一种深度情境化的方法，探索情境变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包括社会的文化、监管和政治方面。例如，Child 和 Marinova（2014）提供了一种对中国跨国企业在非洲的深度情境化分析，这是一种具有独特前因和后果的新现象。通过聚集于特定情境中的特定现象，他们能够勾勒出研究进程，并对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洞见。然而，深入的情境化分析需要对当地相关情境的深入了解，并且较多接触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学术工作。在我之前提到过的关于越南的研究中（Meyer & Nguyen, 2005; Meyer & Tran, 2006），当地的学者对帮助我理解越南的情境至关重要。

四、专注中国的管理研究路径

鉴于每种方法都有其缺陷，学术界需要鼓励方法论的多元化来促进丰富的情境感知理论的发展（亦可参见 Meyer, 2006; Meyer, 2015）。学术话语生存于充分讨论，受到各种形式证据的支持。即使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商业情境都有明显的特点。因此，为了加深我

们对管理现象的理解，最好的方法是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来建立理论，同时他们也能够互相对话。

这类研究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平衡本地相关性和全球普适性之间相互冲突的压力这也决定了期刊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观点。前者的风险是可能会过于关注本地现象，最终会“重新发明”，发展出与全球的学术话语不兼容的学术术语。后者的风险是，用忽视当地关键现象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因而解释力很低。针对国际受众的期刊感兴趣的是与读者相关的理论洞见，这些读者对具体的情境（无论是行业、国家还是一段历史时期）没有特别的兴趣。尽管我对管理学研究中“一般理论”的解释能力持怀疑态度，但我将“相关性超越特定情境的理论洞见”视为学术期刊的合理预期，只要“理论贡献”被更宽地解释。中国的实证管理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Oded Shenkar 指出了需要混合方法。图 1 的框架源于徐淑英（2004）和 David Whetten（2009）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机会。

实质上，学者们用三种方法来调查当地的情况：第一，他们可能会在全球管理文献中采用一个前沿的理论或概念，并研究在特定的地方情境下，该理论是否需要修正从而更具有相关性。

第二，他们可能需要发现与理论不相符或者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本地现象，然后利用文献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从而修正理论。David Whetten（2009）将这些方法分别称为“理论的贡献”和“对理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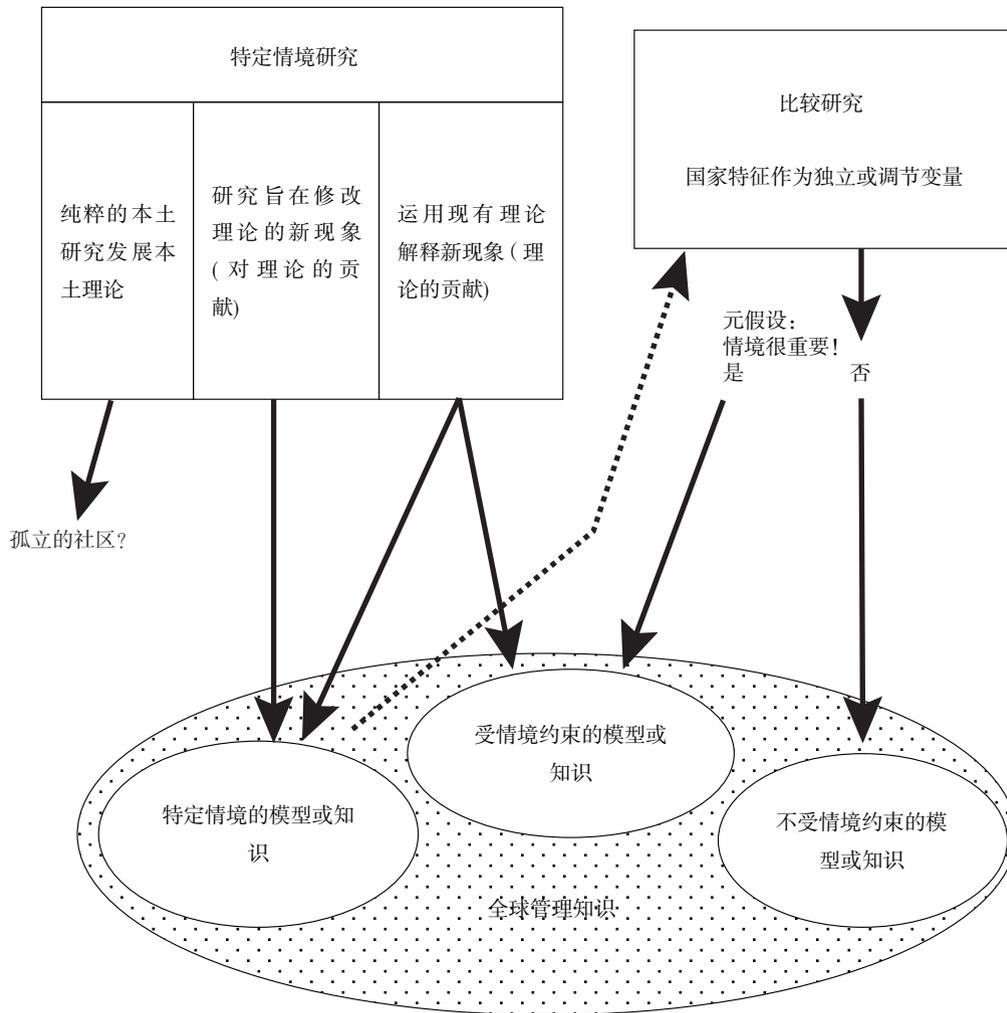


图1 学术管理研究与管理知识的类型学

这两条路径都丰富了特定情境的管理学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在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情境如何和为何影响结果的情况下，就已说明了什么理论应该应用于给定的情境中。有时，理论的应用（如复制研究）有助于阐明一个理论的情境边界，从而创建情境边界理论，即清晰说明应用的情境条件的理论。注意，在这里，对理论的贡献从一种新的现象或者是理论与经验观察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在产生新颖的理论洞见上

比“象牙塔”学者偏好的“理论差距”更为强大。

第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借鉴中国的儒家、法家或道家思想来发展中国的本土研究。例如，Fang (2012) 一直在努力建立一种阴阳文化模式以捕捉他在许多文化中所观察到的相对倾向。最近，Jing 和 Van de Ven (2014) 在成都公交集团的案例研究中应用了相同的概念，以发展组织变革的“阴阳”模式。Xing 和 Liu (2015) 分析了在中国的管理中诗歌的使用，尤其是中

国领导人在其领导中运用诗歌的不同目的。追求这条道路的学者面临的挑战是发展（或保持）一种共享的语言，使他们能够与自己社区之外的学者交流。然而，鉴于最近的工作，我比 Oded Shenkar 更乐观，因为中国的本土研究可能会在中国发展出新的见解，最终将影响中国以外的学术话语。

五、结论

中国为情境敏感的管理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些研究可能最终会挑战特定学术社区的聚焦“一般理论”的意识形态。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研究中对影响所研究的现象的情境边界条件进行仔细的关注和解释。

（接受编辑：李海洋

翻译：钟惠琳

校对：李炜文、朱沅

收稿日期：2017 年 6 月 12 日

接受日期：2017 年 8 月 31 日）

参考文献

[1] Shenkar, O. :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管理学季刊》，2017 年第 1 期。

[2] Bettis, R. A., Helfat, C. E., & Shaver, M. J. 2016. The necessity, logic, and forms of replic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1), 2193-2203.

[3] Bleijer, M. I., Calvo, G. A., Corricelli, F., & Gelb, A. H. eds. 1993.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From recession to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4] Chan, C. M., Makino, S., & Isobe, T. 2010. Does subnational region matter? Foreign affiliate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11), 1226-1243.

[5] Dore, R. D.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Durkheim, E. 1895.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 Sociologique*,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7] Estrin, S., ed. 1994 *Priv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Key issues in the realignmen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gman, Essex, UK.

[8] Estrin, S., Baghdasaryan, D., & Meyer, K. E. 2009.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human resource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6 (7), 1171-1196.

[9] Estrin, S., & Meyer, K. E., eds. 2004.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emerging market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10] Eucken, W. 1952, *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7th ed. 200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1] Fang, T. 2012. Yin Yang: A new perspective on cultur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1), 25-50.

[12] Filatotchev, I., Strange, R., Piesse, J., & Lien, Y. C. 2007. FDI by firms from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 556-572.

[13] Gibney, F. 1982. *Miracle by design: The real reasons behind Japan's economic success*, Times Books.

[14] Goldschmidt, N., & Wohlgemuth, M., eds. 2008, *Grundtexte zur Freiburger Tradition der Ordnungsökonomik*,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5] Hall, P. A., & Soskice, D.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 (2-3), 61-83

[17] Hayek, F. A. 1994.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18] Hofstede, G. 1993. Cultural constraints in management the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 81-94.

[19] Hofstede, G. 1996. An American in Paris: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ty on organization theor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17 (3), 525-537.

[20] Jackson, G., & Deeg, R. 2008. Comparing capitalisms: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4), 540-561.

[21] Jing, R., & Van de Ven, A. H., 2014, A Yin-Yang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engdu bus group,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0 (1), 29-54.

[22] Judge, W. Q., Fainshmidt, S., & Brown, S. 2014. Which model of capitalism best delivers both wealth and equ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4), 363-386.

[23] Kojima, K., & Ozawa, T. 1984, Micro- and macro-economic model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Toward a synthesis,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25 (1), 1-20.

[24] Kornai, J.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1687-1737.

[25] Lavigne, M. 1995.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6] Meyer, K. E. 2006. Asian management research needs more self-confide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 (2), 119-137.

[27] Meyer, K. E. 2013. What is, and to what purpose do we stud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Insights*, 13 (1), 10-13.

[28] Meyer, K. E. 2015. Context i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1 (3), 369-377.

[29] Meyer, K. E., Estrin, S., Bhaumik, S. K., & Peng, M. W. 2009.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y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0 (1), 61-80.

[30] Meyer, K. E., & Nguyen, H. V. 2005.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Vietnam,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2 (1), 63-93.

[31] Meyer, K. E., & Tran, Y. T. T. 2006. Market penetration and acquisition strategie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Long Range Planning*, 39 (2), 177-197.

[32] Meyer, K. E., Tran, Y. T. T., & Nguyen, H. V. 2006. Doing business in Vietnam,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8 (2), 263-290.

[33] Nguyen, H. T., & Meyer, K. E. 2004. Managing partnerships with state-owned joint venture companies: Experiences from Vietnam, *Business Strategy Review*, 15 (1), 39-50.

[34] Murrell, P. 1991. Symposium o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4), 3-9.

[35] Redding, G. 2005. The thick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societal systems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6 (2), 123-155.

[36] Schmoller, G. 1904. *Grundriß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37] Schumpeter, J. A. 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38] Shenkar, O. 2004. One more tim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a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5 (2), 161-171.

[39] Shi, W. L. S., Sun, S. L., & Peng, M. W. 2012. Sub-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ntingencies, network positions, and IJV partner selec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9 (7), 1221-1245.

[40] Tsang, E. W. K., & Kwan, K. M. 1999. Replication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4), 759-780.

[41] Tsui, A. Y. 2004.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4), 491-513.

[42] Weber, M. 1920.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Mohr, Tübingen.

[43] Whetten, D. 2009.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Review*, 5 (1), 29-55.

[44] White, S. 2002. Rigor and relevance in Asian management research: Where are we and where can we go?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 (2), 287-352.

[45] Whitley, R. 1999. *Divergent capitalisms: The social structuring and change of business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6] Witt, M. A., & Redding, G. 2013. Asian business systems: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 clust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business systems theory, *Socio-Economic Review*, 11 (2), 265-300.

[47] Witt, M. A., & Redding, G. eds. 2014. *Oxford Handbook of Asian Business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 Xing, Y. J., & Liu, Y. P. 2015. Poetry and leadership in light of ambiguity and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1 (4), 763-793.